

還俗記

(三)

鈕先銘

——天堂叉路上

列隊購票嗒若寒蟬

我和師傅一走進車站，就覺得內外的情形是迥然的不同。雖然裏面也有許多人，可是靜得來却鴉雀無聲；而且一行一行的整整齊齊的排着隊，一共有三四條行列，其先頭都向着購票的窗口。京滬線的南京總站到底有幾道門我已記不太清楚，大概是有五道出入口。因為每道出入口的兩傍都站有日本憲兵，一進了門也就是進入到鬼子兵所監視的範圍之內。無怪乎中國老百姓便噤若寒蟬，連每個人呼吸的微音，幾乎都怕被日本憲兵聽見，捱息得像窒息了似的。

我本是跟在老和尚後面的，但一踩進了車站的玄關，見到那一番情況，便不知不覺的用細步追趕了幾步，過猶不及的，幾乎趕在老和尚的頭去。

「跟到我的後面去，我們現在要排隊去買票。」守志師傅用眼色指揮着我，同時輕輕的向我說着。

老和尚似乎是很熟習此間的情形，毫無考慮的走向一隊的排尾，我緊貼着他而跟在後面。他為什麼要選擇這一隊呢？是否也有頭二三等之分

？我不知道！可是觀察各排隊行列中的服裝，一時雖分不出來他們在社會階層的身份。同是被征服者，縱使以前各有不同的環境，而現在却同一樣變成了奴隸，根本沒有什麼分別。

京滬線上行路難！

我轉頭看看車站中心所懸吊的大鐘，清晨的時間還不到七點，距開車的時刻，還有一點鐘以上的餘裕。而我們的來到已不是最早者，正可以說明老百姓在京滬線上的行路之難。當時的京滬線上，到底能對開幾列客車，我無從查悉？我也似乎無心去研究；但至少是與老和尚所說是相符的，那便是並沒有夜車，因為怕中我們的埋伏——游擊。

站裏除了列隊等待購票者外，當然也有人在穿梭的來去，但大致都是鬼子兵，極少是中國人；即使有，也是被迫的奴役者，那位去接我們來車站的小兄弟早已沒有看見了，他根本沒有進入到車站來，據老和尚後的說法：他是一段一段將我們遞交給另一組的人，而那些為鬼子兵所拉去的民伕中有一半以上都在幫會的組織裏，所以情報的傳遞是相當的迅速與靈活，鬼子兵一切

舉動，幾乎他們都完全可以觀察到，但是他們對軍事的知識不足，縱使有所察悉，却不能作正確的研判，同時政府也沒有充份的加以組織和利用，使得許多有價值的情報都成為浪費；最主要的是沒有通訊系統，一瞬間便又成了明日黃花。

車票發售開始於七時，是開車前的一個鐘頭。售票窗口用了一層不透明的色紙隔絕着，內裏是否有日本人在監視，我無從觀察。總之手續倒還算相當的簡單，票錢和通行證一並的塞進去，很少有用語言上的問答。可是當時的照相行業還沒有完全恢復，通行證上沒有貼相片，和以前的防疫證上一樣，還是在註記欄內，記載着特徵。照這樣看來，張冠李戴，調包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。我們的通行證是直接向日本憲兵隊領的，如向偽組織的機構去領，到底是怎樣的情形，我和老和尚都沒有那種體驗。

珍藏法幣暗縫衣裡

買車票用法幣或日幣都通用。在被佔領的地區，使用敵幣是必然的現象；可是當時我還沒有見過鬼子兵的軍用票，那大概是爾後才發行的。鷄鳴寺由於鬼子官兵的來遊與「購字」，我

們每天都有相當的收入，完全都是日幣；而日幣的兌換率到底是多少，我已經不復記憶，但日幣高於法幣，同時也超過法幣的通行信用，那我還留着很深刻的印象。

我與老和尚所用來購車票的也是日幣，這當然是我露字或香火錢所得的一部。我於去年十二月十三逃亡到上元門永清寺裏，第一便是要改頭換面，當二空為我換僧衣的時候，曾將我所隨身攜帶的一疊鈔票，藏匿在永清寺柴房後院的花鉢底下。那筆錢爾後我分了一部給師傅守志，從永清寺回到鷄鳴寺的初期，也用過我這筆錢來維持生活。但其中有二三十元法幣，我却縫在一件僧衣的下擺裏，以備爾後逃亡之用，當時的打算是：縱令餓死也不再去動用它；用會計制度的術語來說的話，那等於是專戶存款，不可以變更項目。可是等到我可以大量賣字的時候，收入則日有增益，當然二三十塊錢的法幣，已失去了它的重要性；同時我離開鷄鳴寺比預期來的較晚，時值盛夏，那件縫有法幣的夾僧衣，已不能再穿，所以我又將那二三十塊錢轉縫在一件僧衣禮服——海青的貼邊裏，這便是我攜帶那件海青的理由，當然也有保存着以為紀念的用意。可惜在八年抗戰中，我上海的家庭，曾遭受到諸多的變遷，那件海青，根本不知去向，僅僅遺存了那部我所恭錄的孝經和幾張相片。

日本憲兵耀武揚威

由於日本憲兵隊所發的通行證是硬底子，車票很快的就購到了手。可是並沒有馬上允許我們進站，又得來一次第二度的排隊，這一次是改向

着入軌口。同時改為兩行列隊，因為有兩個軌口可以剪票進站。而在剪票之前，又還有兩道手續；第一道是檢查行李，第二道是用噴霧式的噴筒來向每個人全身消毒。

在售票將接近尾聲的時候，一個類似班長階級的日本憲兵，突然大聲的叫着：

「叫他們整齊的排列起來。」

他的聲音很大，雖然這並不是一句軍隊術語的「口令」，可是他用口令的音調和方式叫着。因為他用的是日語，當然有許多中國老百姓聽不懂，由於他的叫聲太尖厲，使得許多人都發生震驚和恐怖。但誰也沒有敢亂動，生怕危險馬上會臨到自己的頭上。這種情形和心情幾乎和八個月前上元門裏被俘的官兵一樣。

我當然聽得懂日語，馬上就明了了那鬼子憲兵班長的用意。最奇怪是我那位守志師傅，他雖然並不懂日語，可是鬼子班長叫喚的同時，他已開始行動，拉着我就向軌口去排隊。

老和尚對於車站的事，事先對每一過程都經研究過，真可以說是駕輕就熟，也足證這位出身於吃糧的和尚，寶刀不老，反應還是那樣的敏捷；不愧為江湖上的大哥，在僧侶中也是方丈級的領袖人才。

老和尚與我動作既迅速，這回我們就排在前面，很靠近那剪票的入軌口。其他的老百姓——乘客，是要等到通過翻譯後才排隊的，已經是落後我們一步。

那些翻譯人員是被迫而來的麼？抑或是僱用而來的，我一時無從揣測。以我當時的判斷，大概都是偽組織中的一批小獍獍。一件白襯衫，僅

戴了一個黃布的臂章以為區別，但臂章上根本沒有綴字。

語言是含着很重的北方口音，至少不帶南京的語尾。可能是日本憲兵隊從北方羅致來的人？當時南京的偽組織並不與北平的偽組織相串連；即至爾後汪精衛來粉墨登場，與北方的王蔭泰也是唱着對臺的傀儡戲。日本人即使是同樣運用漢奸，也有輕重緩急與厚薄之分。換言之：除了孫子與兒子不同外；嫡子與庶出也有所分別！對汪精衛是遠不如對王蔭泰來得信任，或許是因為汪與王多了三點水，走狗的忠實性，就分了等級。

曾仲鳴做了替死鬼

汪精衛與着尾巴逃離重慶是發生於廿七年十一月的艷電，經過海防的一段時期中，幾乎挨了我方人員的一鎗，所不幸的是曾仲鳴却做了替死鬼。

打那一鎗的射手，是現在尚服務於臺省警界的要員王魯翹兄。魯翹曾與我同期受訓於實踐研究院，我們會當面質疑於那件事。可是魯翹却不肯詳細的為我們這班同學來說明，只是歎了一口氣說：

「惜乎！擊之不中。」

據我所知道的史實是：汪精衛與曾仲鳴等自昆明飛越南之後，即匿居於海防的一所花園洋房裏。樓上共有兩間臥室，左為汪居，右為曾氏下榻，汪為逆魁，他住的房間當然是大於曾仲鳴的。在定居後不久，曾仲鳴之妻不知從什麼地方也來到海防探夫；由於曾仲鳴來了一位太太而汪妻陳璧君並沒有在身邊，所以汪就將那較大的房間

讓曾氏夫婦住。這一段換房的經過未為我方的情報所探悉，所以我們的人員侵入之後，還是照着預定的計劃，隔着房門（也許是因為由於內部已上鎖）就用手提式機關槍向裏面掃射。在那瞬息之間，只聽見一個廣東女人的口音叫着：

「仲鳴呀！你死莫得啦！」

在廣東的口音，仲鳴與兆銘非常容易混淆，所以魯翹便以為已經得手而離開了現場。

上述的一段故事，並非出自魯翹之口，是我同學中有自稱為「消息靈通人士」在「地下講座」時所敘述的；我們在受訓期間，一有閒空便大擺其龍門陣，在這種龍門陣中的領導人物，我們都尊稱之為「地下講座」。

魯翹對此事始終是守口如瓶，也許是遵守着保密的規定。但事已隔三十年，環境早已變遷，即以白皮書來發表秘辛也未為不可，所以我在此還願再度質疑於魯翹。

「惜乎擊之不中」，在魯翹是以詠史的口吻而並沒有加以默認。可是即使是「幸哉！擊之已中」，而僞府還是照樣會成立的，因為日本要的是一個傀儡，何稀罕於汪精衛一人哉？然而在汪精衛本人却大大的不同了；我記得有一首詠史的七絕詩說：

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土時；

但使當時身便死，一生真偽有誰知？

假設汪精衛在「地下」有靈的話，他自己也會說：「惜乎擊之不中」了。他會恨死魯翹，而不是感激魯翹。

汪精衛墳墓被炸平

在此我不得不加述一段八年抗戰勝利後有關汪精衛的故事：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八日，我追隨當時兼任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敬之上將回到白下，除了受降外，我們還有一件優先的事，便是敬謁中山陵；其意義正如放翁的詩云：

王師北上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。

晉謁中山陵，當然也順道去看看明孝陵，在兩陵之間的梅花山上，汪精衛的墓却赫然存焉，青山不幸，埋此奸骨，真是一件極為醜惡的場面。但不久軍中有一批氣兒壯的小老弟們，在一夜之間，用了幾個黃色藥包，將汪墓炸平了。既未呈報核准，事出自由，在行動上來說是逾越紀律的，可是炸的却是頭號漢奸汪精衛的坟，公憤所集，上峯也不便嚴加追究。可是餘波的災禍却落在我的頭上。

記得是一個嚴冬的傍晚，走了四十幾天水路的妻子，行裝甫定。當時從重慶來還都是一件大事，兼之冬季水枯，在長江的航運間耽誤了一大段的時間。我正和妻子在整理南京的居所，這所小樓是大舅老爺謝承瑞的遺產，爾後當然是奉還了謝家，初回南京的時候，我却借用暫居。正在與妻敘別的時候，樓下忽報客來，還不容許我請教姓名，那位年輕的女客便啾天號哭，大鬧大叫，真叫我丈二的和尚，摸不着頭腦。仔細傾聽，才知道是汪精衛的女公子，此行是專誠來向我作問罪之師；因為當時有關敵偽的業務，全歸我手掌的二處所處理。

突然其來的無名災害，我却非常的冷靜，對那個無理取鬧的女孩子，不便作正面的衝突，盡量讓她去哭訴。在她一陣高潮過去之後，我燃了

一支香菸，很平靜的問她說：

汪逆兒子狂妄幼稚

「妳是不是有一位令兄曾在歐洲麼？記得我留法的時代，也曾有過一面之雅；不過我對妳令兄的印象却不太佳。聽說他想要買一輛汽車，這本是一件極尋常的事，可是他問人家希特勒座車牌子，結果他買了一輛和希特勒一模一樣的「奔馳六百」，令兄要想與希特勒較量富貴，我覺得是未免有點兒作威作福！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可說是非常的壞，儘管他對我們的交往並沒有什麼不禮貌。」我又吸了一口煙，繼續的提高聲音說：

「今晚妳來見我，一開始就並不友善；但我却很欽佩妳；並不是欣賞妳的潑辣，而是欽佩妳對父親的孝心。」我將大母指題了一題，換了較輕而親切的語氣再說：

「可惜妳不懂得大義滅親這四個字的意義！但愚忠愚孝總是值得頌揚的。汪小姐！我倒要問妳，我姓鈕的和妳們姓汪的有什麼私仇？偏要掘妳的祖坟！妳好生想想這個道理看！」

當時我並沒有申辯，這道掘坟的命令並非我下的，這種理由用不着詳細去解釋，盡忠盡孝，孰重孰輕？只有自己去體會與判明。我當時不好說得：

「戰場上的嘶殺不談，日本軍無辜活活的殺死了我們多少的老百姓，雖非此時，而却是此地的南京，我就親歷其境過。妳那位姓汪的老子，不但不和日本軍算算血債，而却附了敵，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。」

當然我和汪小姐講理也好，發狠也好，都是白費的；只有用親切的安慰，才能打發她回去；這樣的總算是平靜的送出了大門。

可是我一回到樓上，發現太太的臉拉得來比驢子還長；她以為在小別的期間，我鬧了桃色事件，所以女人在她還都的第一天，便打上了門。

「太太！這不是桃色事件，而是梅花事件。」
接着我將汪精衛鞭屍的經過，用輕鬆的口吻告訴了她，她在戰前是生長在南京的，中山陵和明孝陵都不知去過多少次？而却不知道有個所謂梅花山，其實那不過是一個山陵起伏的小丘而已。

「你爲什不叫人趕她出去，這種無理取鬧法！」太太還是耿耿於心，總覺得我對待汪小姐太軟弱了。

「啊呀！太太！從另一個角度去看，人家的祖坟被掘了，她私人總會覺得有點氣憤，我就權充當一次她的出氣筒吧！不就完了。」這是我的答復，也是我的心情。

汪精衛女兒當修女

後來聽說這位小姐當了修女，現在在馬來半島。終身不嫁，獻身於上帝，以贖乃父之罪，倒比晚節不全的父親來得道高一丈。回想在炸肅親王的當年，汪精衛何嘗不是一條好漢？政見不同，自古有之，認賊作父，則品斯下矣，可惜他既沒有殺身成仁於刺殺親王，又沒有死於海防我方的防微杜漸，那真可以說是他的命運安排得太壞了。

民國三十二年在重慶，爲了一件情報的洩密

，有人誣告我是僞府的奸細，使得當時的參謀總長何敬公大發雷霆。我的頂頭上司楊宣誠中將却拍胸的呈復着說：

「鈕先銘若肯當漢奸的話，至少應當做汪精衛僞府的情報廳長，不會做我一廳的小參謀：……」

此事我在拙作空門行脚中也曾敘述過，讀者諸公，也許會錯覺到我和汪精衛到底有什麼淵源？何以遇事都牽涉到我？其實我與汪精衛真是素昧生平，他固然是命苦，我也何其倒霉！城門失火，却殃及了池魚。

我在南京落難的時期，汪記僞府還沒有着手，那些爲日本工作的譯員，應當是屬於大道政府。我對於那些低級的小漢奸，倒也未便嚴譴。當然，全民抵制，寧死不屈，這固然是我們所希望的。可是淪陷區的人民，手無寸鐵，而且戰爭還未真分勝負，徒死又何補於國家？既要生存於敵區，通譯是非常必要的，免得發生許多的誤會。只是應當在態度方面好一點，不要懷着自己是日本人的兒子，老百姓却是日本人的孫子的這種觀念，那也就够了。

小漢奸們的嘴臉

由於通譯者轉譯的一叫，車站中已購得車票的人，隨即向入口口排列得整整齊齊。

「將行李就地的打開來。」

這回不是由鬼子兵下口令而轉譯的，而是那些小漢奸們自作主張的叫着。大概是由於每天的動作都胡塗一樣，所以就越俎代庖了。

排隊時因人與人之間並未保持距離；一蹲下

來就不免你衝我撞，多少有點騷動；排尾的人不但不遜次的後退幾步，讓出一點空間來。

「不准亂動！」這又是那位通譯人員的叫聲。

所幸並沒有人是挑擔抬箱的；行李既簡單，稍爲側過一點身子，就地也就打得開了。檢查行李也是中國人在執行，當然憲兵隊的鬼子兵還是叮在傍邊，有時也用那黃皮大馬靴踢踢老百姓的行李，卻沒使出那些驚心動魄的狠勁兒來。檢行李的主旨似乎是在有無隱藏武器？對其他的東西却不太嚴格。當然，在這種非常而又兼痛苦的環境中，不用說：決無觀光旅行的乘客；即使有事，能省也就省了。這種心情下所攜帶的行李，還會太多麼？更不會有違禁品；何況都恐懼着「心焦心焦」，（註：「心焦」爲抗戰時日軍向我老百姓索物所用之語，日文中並無此話，我爾後亦曾請教於精通日文者，謂爲「進上」之發音，我音譯之爲「心焦」。蓋日軍規奪，我們不得不心焦也。）連稍爲值錢一點的東西，也就不敢攜帶，所以執行檢查的過程，也就非常的簡單。

這一次的乘客到底有多少？我沒有心情去暗察和暗計。大概總不會超過三百多人呢！照兵學交通教範上所規定，每一節本是搭乘七十至八十個人，這是連同步兵自身所攜帶的裝備。至於說一列車到底是串連着幾節車？那要看車頭的出力大小而有所不同。客車是要注意到乘客活動的空間，根本與載重無關，這一次只有三四百人，那末這一列車大概不會超過四五節車箱。

檢查雖然很快，但距離開車的時刻，也只賸下十五六分鐘了。鬼子班長示着那個譯員可以

允許乘客進站了，就在這發令的同時，在入軌口剪票處出現了四位穿白衣的人，很像醫師，又像護士；各人手上提着一架噴霧，在剪票間隙間，向着每位乘客噴射着消毒劑。從南京到上海所經的地區，可以說都是戰場；盛夏中傳染病的流行，勢所難免。敵軍能澈底的做消毒工作，從某一種角度來看，還是值得欣慰的。雖然敵人也是爲了自己軍隊的安全，但陷區的老百姓，到底比敵軍的數量大得多，至少這是利人利己，而不是損人利己的事。

京滬線上最後行程

我和守志師傅因爲在第二次排隊佔了先，所以我們一經剪票消毒後，也是佔先的進到了月臺。列車早已停放在站邊，但不只四五節，至少有十節以上，先頭幾節是鐵皮貨車，我想大概是屬於物運或軍運的範圍，僅以乘客車來看，有四節車就夠用了，我們既佔了先，當然就優先上車，位子也就由我們先選。

「就坐在靠車門的地方，上下都方便些。」守志師在這一段時間也許是緊張過度了；但他的性格，不應當如此，或許是因爲到底有那把年紀——七十歲的老僧，從昨日下午出鷄鳴寺起，在十六個小時之內，睡覺還不足四五個鐘頭。不必說到奔波，即以那種提高警覺的情緒來說，也就够受的。所以他一上了車，便就近選了個座位坐下同時用手指，將靠窗的那空位讓給了我。雖然我倆的行李一共才一個小包袱，可是我還是伸起手來，將它放進那高架的網籃內。然後我就和師傅並排的坐着。

乘客都陸續的上了車，有條有理依次不亂的都坐了下來。我突然湧出了一股感慨，爲什麼我們中國人生得那樣的賤！要在刺刀下才會嚴守紀律。在公共秩序上，我們過去實在太差了，這末必是我們民族的弱點？

火車準時開動了，我大概也和師傅一樣，閉緊了的情緒一下子就鬆弛了下來，久已悶在心頭的一口氣，好像可以就此吐出。雖然離上海還有一大節路程，可是已經上了車，而車又開動了，豈不是等於過了關。可是正當我在想說一句話來和師傅攀談的時候，我突然發現站在車箱與車箱間的過道處，却站着一名武裝齊全的鬼子憲兵。我調轉來向那一頭一看，也是同樣的有那樣一名鬼子。無疑在每節車的兩頭，都有鬼子兵在監視着乘客，以防中途發生任何不利於日軍的行動。

這一次我那位師傅却打算錯了，選擇的座位離得日本憲兵太近，我們的一舉一動，無疑的是最容易惹着他的注視。假設能選在那節車的中間，至少不必在那虎視眈眈的目光下打寒噤。這也難怪守志師，連同施施主——那位江湖大哥在內，在他們所能打聽得到有關乘車狀況中，却無人有過開車後的經驗；所以守志師傅才無意中選定了那離憲兵最近的座位。

當時京滬淪陷已半載有餘了，日軍爲了確保他們的統制權，憲兵當然已不在公共場所明目張膽的殺人，可是我一看見他們便噁心，倒也不定是那麼樣的駭怕。我本想和師傅說句什麼似的，可是到此却被那股噁心所阻了回去。

張望山川已非曠昔

行車速度也不算太慢，我憑窗放縱着我的視線，深深的感覺到：空悵望，山川形勝，已非曠昔！沿途真是有那麼大的變遷麼？那倒也不見得。京滬戰爭是着重在上海與南京兩地，尤其是攻打南京，是由金山衛登陸所迂迴的作戰，所以鐵道沿線的村鎮，都反而沒有太受到戰火的破壞；我所說的：山川形勝，已非曠昔的這句話，無寧是心理上的感觸，遠勝過野視的直覺。

車子雖不是見站即停，可是一停卻很久。此既不是觀光，更非公務，而是倉促的逃亡，當然事前也無從去研究行車表，這一次車，到底是慢車還是快車？抑或在這種非常的時期中，根本就無所謂快慢之分。沿途的停頓，並不是爲了旅客的上下，自可斷言。是爲了措車，或是忙於軍運？則不得而知了。只知道每隔多少站，便更換另一批憲兵。就這樣子逐站移交，而監視着我們的行程。除了幾個大站以外，車站都沒有掛鐘，正確的特刻在多變的環境中，我很難推測。

京滬車上三多三少

我看了一陣子窗外之後，回轉頭來再看看車裏的情形，我發現有三多與三少。第一是男人多而女人少；我前文也敘述過，在這種時期，誰還作不必要的旅行。陷區雖初告苟安，但日軍暴行的記憶猶新，女人當然還不敢隨便出門。在我乘坐的那一節車上，可以說沒有一個女客。在排隊購票的行列中，我倒也看見過一兩個女人，大概都是五十以上的年齡。第二是粗人多而知識份子少；第三是老人多而壯丁少。這二件事可以相提並論來聊聊。政府西移，知識份子隨着內遷，壯

丁不是從軍便被迫害。這兩種人少，乃是必然的現象。還有一個因素是很值得注意的，一個暴力統治，最顧忌的是被征服者的「智與力」，智是知識，力是力量，老弱愚民則毫無作用，所以在日軍的騎蹄下，只有這種人比較容易苟延殘喘，換言之也只有這兩種人的行動比較自由。施施主兩匹仁丹鬍子，粗眉大眼，目光眈眈，他到底有多高知識程度我不敢說。雖然一眼看上去，並不像是一個愚民，可是其所能幸免於鬼子兵者，就是仗着他那七十歲的高齡。再以此這一次逃離虎口來說吧！騙取憲兵隊的通行證，是師傅老和尚去出的面；而乘車赴滬，爲我掩護，也靠老和尚，無非都是針對着日軍心理上的弱點。

許多描寫戰爭或間諜的影片，對於淪區的火車和車站的鏡頭，都不太合乎實際，只有我才真有這種親歷的經驗。在鬼子憲兵監視下，我不敢過份的東張西望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線視，閉上眼簾，一隻手搓着頸項上所掛的佛珠子，以作唸佛狀。另一隻手偶然的一按車座的座墊，却又有一種新奇的發現。

由南滿路調用客車

我們坐的那一節車，是一輛正式的三等客車。我國素因經濟落後，車輛缺乏，所以常常用貨車來改裝客用。雖然也有座位，是像市內公共汽車似的，分成兩排長凳。但正式的客車則不然，不論是頭二三等，座位都沒橫列的。其等級的區分是在乎坐墊的軟硬，空間的寬窄，以及靠背是否可以兩面移動。一般在戰前大陸上的三等火車，很少有軟墊的座位。而我們這次所坐的却極像

日本國內的三等客車，連座墊綠呢，都是同樣的材料。

錢塘江鐵橋的落成，正值抗戰的前夕。使用期間雖短，但却發揮了最大的效力。那便是將所有的車頭和車皮，經過這一道鐵橋而移轉我們的後方。當然我不敢說是全部而一輛不遺，可是像這樣合乎標準的三等客車會遺留下來麼？同時又何以與日本式的三等車可以亂真？甚至於座墊的材料與顏色都同質。

日本本土所敷的軌道是一〇六七公厘的窄軌，根本與我們所採的一四三五有所不同，所以我判斷我們所坐的那節火車，一定是南滿鐵路所轉過來的。昨夜，在施施主的行館裏，曾聽到我軍在魯南的大捷，那便是台兒庄之役，我當時坐在車裏想，假設我軍還佔有平浦線上任何的一點，那末南滿線上的車輛就無法經北寧線而駛入到平浦，再輪渡到京滬。交通是戰爭的命脈，敵人的血液循環既比我們流暢，那末機動和補給都倍於我方的靈活。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，許多人都相信這樣一句口號：「以千個打一個，也得打垮他。」這種信念固未可厚非，但是這種戰術思想，却是錯誤。因爲十個人並不能只食一個人的糧食；補給十個人的糧秣，而來打一個人，那末我們賠本就未免太多了。可是吃不飽的兵，又如何能打仗。

當我發現所乘的這輛車是來自於南滿的時候，我真有點不寒而慄。

大小車站荒涼冷落

「餓不餓？我們還帶了有饅。」老和尚打斷

了我的思潮而問着我。

「我不餓，師傅！你自己吃。」

「不吃也罷！又沒有水喝。」

京滬線上的車站，原是有許多小販的；可是在這大規之後，是乘客買不起？抑或是日軍根本不准小販進站，總之沿途什麼東西都沒得買。硬饑若沒有茶水，當然是很難下嚥。也許我在鷄鳴寺被養驕了，遠不如像在永清寺那樣能吃苦。

「我們到了上海再吃吧！」這句話幾乎是我與老和尚同時說出來的，這樣，我們師徒又作了一次會心的微笑。覺得我們逃出虎口的勝利在望，頂多亦要再忍耐兩三個小時就夠了。

守志師傅並不須要逃出淪區，而是專誠的掩護我，由於具有這種佛祖拯救精神，所以他對於這次成功的切望，也並不下於我。

京滬間的快車最多不過行駛五六個小時，這回却走了九小時才到，等我們到達上海北站，已經是下午五點。從鷄鳴寺出發，到此已是整整的二十五個鐘頭。

上海北站，是否曾經被破壞，抑或是修復？我完全沒有心情去注意。讀者諸公！請你試想想看：從客歲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之日起，迄茲是八個月差兩天。當天是八月十一日，也正是八一三週年紀念的前兩夕。在這二百四十天左右日子裏，我是怎樣過的？當然在永清寺的後段以及鷄鳴寺的末期，並沒有受到任何的迫害。可是，挨一刀倒也無所謂，一天一天的來被折磨，在心理上却是一件很難忍受的事。所以等火車一進了北站，我的身體當然還是得隨着許多乘客一致行動，可是我的心反而急速的跳着，恨

不得馬上插翼就飛到家裏，然而事情却没有那樣的簡單。

購票上車，我們曾經排過隊；這回下車，鬼子兵也不會那樣容易的饒我們。在上海車站裏，又有和南京車站一樣的那麼一批譯員，在鬼子憲兵的指揮之下，將這些乘客分成了兩組。一組是志願進入租界的，一組是要留在上海陷區中的人。

天堂地獄一水之分

戰前上海共有二個租界，法租界是單獨的。公共租界本是英美義日等共同組成；可是以蘇州河爲界，以北的地區全是日本的勢力範圍，所以虹口一帶等於是日本獨占的權利，在廿六年八一三揭開戰火之後，我軍曾一度攻入這個地區，所謂「四行倉庫」之戰，與英美的租界，僅蘇州河一水之隔。鬼子憲兵所要區分的就是要知道誰是進入英美範圍租界的人，雖然僅一水之分，但是這是天堂與地獄的分野線，只要一踏過橋，日軍就管不着了。

我上海的家是在公共租界的新開路，所以我和師傅並向那一組去排列。

「這是怎樣一回事？」師傅問着我。

「還不是又要排隊。」

「不要緊麼？」

「有什麼法子。」

到了上海，也就是超出了施施主的勢力範圍，所以老和尚就摸不着頭了；一摸不着底兒，守志師傅當然就有着慌，所以遇事就問着我。我何嘗不也一樣，所不同的僅不過是用不着通過譯員，先聽懂了鬼子憲兵的話而已。諺語云：行百

里者半九十，最後的五分鐘，我也只能強自鎮靜來應付。

這一次排隊所費的時間比在南京車站還長；檢查行李也比較嚴格，每一件衣裳，都得抖開。而每一本有字的文件，都得經過翻閱。到此我才明白：在南京車站上是檢查武器和炸彈，怕的是中途發生襲擊。而上海車站所檢查的呢，目的在於有無間諜行爲，所以對有文字的東西就特別的注意。我們所攜帶的東西，當然不會有問題，而那本寫經和幾張和尚裝的相片，反而增強了我的掩護。

志願進入租界的人，比例較多。是否其中也有和我一樣的只進不出的人在內，我疑從探悉；可是誰也不願志願長期居處地獄，乃是必然之理，根本不用去問。

行李檢查就費了一個半鐘頭，我看見車站的大鐘，已是下午六點三十分；所幸是晝長，太陽還沒有完全落山。

車站外面，排列了十幾部「巴士」式的交通車，我們仍是被驅使着依次登乘。是否也會收了我們的費用，我已不復記憶，總之在譯員的口中，我們知道這是真正開往租界去的，假設他們不是存心欺騙我們的話。

槍托指揮兇神惡煞

車子編隊開動了。北站距蘇州河邊只不過三幾公里，這一下子總該踏入天堂了吧！不要急，還不能有那樣的快！就在這樣一段短短的路程中，我們這一批來客，又經過了十次檢查，有海軍也有陸軍，從軍服上去看，便一目了然。三步一

停，五步一站，有的是上車來觀察一番，有的是勒令全體下車，在路傍又重新檢查行李。最奇怪的是沒有隨附譯員，所以並沒有用語言拷問。然而一切都是用槍托來指揮，自然是凶神惡煞，所幸是並沒有傷人，也沒有「心焦心焦」的搶奪事件。

十多輛公共汽車在白渡橋的左岸停下來了，從中國司機的口裏，我們才知道從這裏可以自由步行過橋。蘇州河上有兩個白渡橋，一個叫外白渡橋，向另外一座橋却没有頂上一個「內」字。我們便是在第二座橋頭下的車。

橋面雖然很寬，而距却不甚長，以橫切線中央爲分野，靠着虹口方向的是站着日本兵，而另一方則由穿着裙子軍裝的蘇格蘭士兵所駐守。步行過橋時反而倒沒有再受到檢查，行經日本兵的面前，每個人都得行個禮，已成了陷區被征服者的習慣，所以即使已走進蘇格蘭士兵的防線，大家也都照行不誤，可是蘇格蘭的士兵却目不斜視，裝着沒有看見似的，當然不會像日本兵那樣點頭答禮的樣式。

呼吸到了自由空氣

我和師傅一踩到左岸的陸地，一同吐了一口氣。不！或許是深呼吸着，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。

師傅劈頭第一句問我是：

「你到底是姓什麼名誰？」

「我姓鈕，叫鈕銘。」

「那個鈕字？」

「鈕扣的鈕。」

「倒是個怪姓。」

「因爲我祖籍是蒙古人。」（待續）